

## 书评富泽芳亚·久保亨·荻原充编著《近代中国的日资企业》

松野周治

(立命馆大学教授)

◎ 原书评刊载于 [日]『中国经济研究』第 9 卷第 2 号, 2012 年, 73~77 页。

◎ 欧文东 译

◎ 原书为 [日] 富泽芳亚·久保亨·荻原充编著『近代中国を生きた日系企業』大阪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vii+289 页。

从 20 世纪初到二战期间、日本在华企业是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开展经营, 与中国企业、当地经济的关系又如何? 针对这样的问题, 此书主要考察了棉纺织业(「在华纺织业」), 也包括其他行业。以前谈及二战前的日资企业多是片面强调某些侧面, 如在帝国主义统治架构中的对外扩张、对中国的控制与榨取等。而此书在分析日资企业的实际形态、背景和作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主要是编者基于大量的日中文相关资料和文献, 包括近年可供使用的在沪、津等地的企业资料(档案), 历时四年的国际合作研究才完成的成果。

随着 20 世纪初东北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变化, 二战前日本对华投资增长迅猛。在 1902 年到 1931 年约 30 年的时间里, 日资企业在棉纺织、铁道、金融等行业的投资额就增加到原来的 900 倍, 使日本从在华最少投资国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投资国, (Remer 估算, 请参考此书 P245·陈论文)。历经战后约 40 年的空白期,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和市场化, 日本对华投资再次猛增并面临各种难题。近几年, 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的规模和行业范围都是以前无法比拟的。但是, 正如此书的“序言”所言, 正确掌握二战前日本企业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情况, 对更深入地理解现在日本在华企业所出现的各种困难, 对构筑更好的日中经济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此书由两部分构成, 第 I 部分是“中国棉业中的在华纺织业”(第 1 章~第 6 章), 第 II 部分是“在华日资企业的各种形态”(第 7 章~第 10 章)。第 I 部分论述棉纺织业这一在 1937 年之前最大的民间投资, 第 II 部分论述国家资本南满洲铁道(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煤炭业、战时日本占领和控制的铁矿业、中小资本投资的骨粉制造业和面粉制造业。

第 1 章“在华纺织业的经营--国内外棉花的技术转让、劳务管理、产品战略、流通”(桑原哲也)认为, 以往多数研究所重视的政治经济条件不是规定在华纺织业得以长期存在和成功的充分条件, 并以“内外绵”(公司)为例, 具体分析了其问题解决过程。譬如, 派遣众多的日本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通过他们参与工厂的直接管理实现了企业初期的快速增长; 由青帮出身的包工头负责招募和管理劳动力, 克服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雇佣关系在增加女工

比率过程中所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推动实施产品的高附加值战略，通过拉大与中国企业的差距，确保了企业的高收益率等等。如此，日本工厂开发出来的技术和经营被转移，并移植到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海外经营中，在华纺织业被定位为日本跨国公司的先驱。

第2章的“内外绵的中国人管理者和监工—由‘特选工人’（「特選工」）到‘职责工人’（「役付工」）（1911-1945年）”（芦泽知绘）通过收集和分析存放在上海和天津档案馆的国内外棉花（企业）资料，揭示了中国人作为中层管理者的实际状况。此章分析了这样的内容。“特选工人”是一战期间被引进的新职级，虽然在中国人中层管理干部培养政策之下得到扩大，但还是失败了。于是，企业开始增加更低职级、仅具备有限职权和责任的‘职责工人’。因管理组织下沉，能监控到生产工序末端的精细化管理成为可能，但企业却没能充分培养和确保拥有高级技术和发挥指导作用的所谓高级技术人员。录用当地人才担任管理要职、这一对海外投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的举措在事实上被逐渐放弃。这一点在资料的论证过程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

第3章“在华纺织业向中国转移技术”（富泽芳亚）论述了在日中战争期间，日本如何通过在华纺织业把在日本的纺织零部件和用品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虽然维持中国纺织厂生产不可或缺的零部件和用品市场被日英两国的进口产品所控制，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为了支持在华纺织业的发展和产品的升级，日本纺织机械企业在中国建立工厂。此外，“内外绵”还接受委托，经营日本军队所没收的中国人纺织企业，建立零部件和用品制造企业，把生产设备从战时经济管制下的日本往已在华的纺织机械企业转移。本章还阐述，这些企业二战后被中国没收，中国在原有日本技术的基础上成功制造出高级机械，促进了二战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

第4章“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棉业和在华纺织技术”（久保亨）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成立后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新增纺织厂大量生产棉纱布，以及通过继承日本在华纺织技术制造出必需的纺织机械等。而且，此章清楚地说明，虽然因朝鲜战争影响、产品出口受限，但是日本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还是面向中国和香港出口了纺织机械和零部件，而且在中国加大出口棉产品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还被进一步扩大。另外，此章还清楚地表明，中国依靠国家财政对重点设备的投资和日本的在华纺织技术，使棉纱布的增产成为可能，这对确保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市场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

第5章“初期在华纺织业--围绕上海纺织的形成”（张忠民著，今井就稔译）通过对所谓“出发点”的研究来论述在华纺织的特性。日清战争前，虽然清国洋务派官僚排斥外国资本的政策阻碍了英美资本设立纺织厂，但三井物产却巧妙地设立了原棉工厂，实现了在广义纺织业上的对华投资。日清战争后，英美资本和中国资本迅速涌向中国的机织纺织业，但经营却陷入困境。而三井物产等日本资本在对华纺织业上的投资却很慎重，仅选择收购现有的纺织厂。此章阐述，在慎重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用较少的资本购得大规模的设备和工厂，成为日本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实现高收益率的主要原因；它的成功促进了“内外绵”等新

工厂的建设。

第 6 章“两次世界大战间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的活动”（阿部武司）全面分析了 1925 年创立的该同业会活动，不仅剖析了如何与迄今仍被研究的劳资纠纷、抵制日货等高涨的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进行对抗，而且还分析了中国和英国资本也参加的印度棉花联合进口组织（1925 年成立，而且在日中战争期间未中断）的运营，以及如何通过协商缩短工时（未成立）等活动应对市场恶化。

第 II 部分由 4 章构成，提到的日本企业不含在华纺织业，论述了两个国家资本主导的企业经营和两个民间中小资本主导的经营企业。

第 7 章“1917-1945 年的抚顺煤炭和南满洲铁道的经营”（陈慈玉著，加岛润译）分三个时期进行论述：1917-1920 年是以中国东北工业的发展为背景，在区域内销售的主导下扩大抚顺煤炭的生产经营；1921-1931 年是以加大火力发电和工业动力需求为背景，在面向日本、山海关内和东南亚出口的主导下发展抚顺煤炭经营；1932-1945 年的经营重新回归以东北内需为主，但并未实现所期待的扩大生产。此章还论述了煤炭和铁路是南满洲铁道收益的两大支柱，论述了铁道收入也依存于煤炭运输等，以及它对南满洲铁道经营的贡献。最后指出，作为抚顺煤炭企业发展的持续性，通过发展煤炭，东北成为重工业资源和原材料基地，使二战后中国的“自力更生”成为可能。

第 8 章“战争期间大冶铁矿和对日供应”（荻原充）是以日本制铁（前身为官营八幡制铁所）的公司内部文件为依据，分析了日本制铁在日中战争期间接受委托并经营大冶铁矿这一中国屈指可数的铁矿之经过，以及在其经营之下的生产情况和向日本供应铁矿石的实际情况。该铁矿所属的汉冶萍公司为偿还日本制铁的债务采取了委托经营的方式。结果，公司得以存续且业主（盛家家族）获得收入，并可对日本制铁履行债务及供应廉价的铁矿石。另外还指出，由于长期采掘，富矿减少、生产率下降；虽因战时特需获得一时增产，但后来却出现了生产停滞、对日供应减少等情况。

第 9 章“1909-1931 年的向井龙造和满蒙殖产的骨粉制造”（吉田健一郎）阐述了创始人向井从日俄战争时的军营小卖部起家到成立满蒙殖产股份公司的过程，并根据营业报告、决算报告和相关调查资料分析了 20 世纪 20 年代该公司的经营情况。虽然面临这诸多困难，但通过自身学习（向传教士学习知识、到欧洲出差）、购买美国设备和申请关东都督府补助等方法，该公司从兽骨交易发展到制造骨粉（化肥）和动物胶。虽然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但由于在日本市场竞争的印度骨粉转移到欧洲市场，该公司的骨粉业生产保持稳定，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动物胶制造得到发展。

第 10 章“日本面粉制造业的对华投资”（陈计尧著，杨素霞译）通过日本对华投资的所谓“失败案例”之一，根据与日本对华面粉出口的关联，着重论述了日本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一战期间设立在关内和东北的日资机械制粉企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陷入了经营困境并渐渐消亡的过程。该章指出了其中的一些背景，譬如：日本机械制粉业获得发展，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开始以中国作为主要出口市场；与在华日资制粉企业发展中的日本制粉业没有资金和经营上的合作；中国资本控制的制粉工业在 20 世纪后，特别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迅速发展，日本资本处于劣势等。

如前述，此书内容丰富。最后，还想在此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几个有待今后研究的课题。

第一，根据与二战前日本对华企业投资整体形态的关联，对各章、各行业和企业等进行更加明确的定位。构成此书的几篇论文有关于对华企业投资分类的叙述。例如，在第 5 章张先生的论文中列举了 20 世纪前半叶在华日资企业的 3 种经营类型，即：满洲国期间的国策公司经营、日中全面战争期间军队占领中国和实行殖民地统治时的企业经营、日中战争前普遍存在的日本资本企业经营。此外，第 9 章的吉田论文认为，以东北为依托的日资企业分为类似南满洲铁道的巨型企业和小型多样化的企业，该论文从后者中摘取其一进行论述。“序言”指出，作为研究对象的企业包括日本直接投资企业、日中合办企业、国策公司所属的矿业部门、日军占领时经营实权掌握在日方的中国投资企业等等。这些研究对象有望得到更积极的叙述。

第二是分行业等对日本二战前来华企业的技术和经营水平进行评估。日本棉纺织业到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最大的出口产业，在二战前保持着技术和经营上的持续发展态势（二战后也继续发展）。在此期间，日本对殖民地和中国等地进行直接投资，并扩大当地的生产规模，同时如此书第 3 章所详述，形成了与日本重要零部件和纺织机械（中间财和资本财）出口的关联。在华纺织业通过产品的高附加值等实现了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企业有区别的事业发展，通过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以及如第 6 章所言的采购印度棉花等实现了与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合作等。在此背景之中，在华纺织业出现了与此类日本棉纺织业在资本、技术和经营等方面的合作。

如第 10 章所显示，此类合作并未出现在制粉行业，中国的日资企业与日本国内的机械制粉业发展处于被隔离状态。即使是在讨论骨粉企业的第 9 章，我们也找不到与日本国内资本有合作的叙述。或许，此类合作在原材料当地加工这一经营项目中根本就难以成立。与当地企业相比，这些行业、企业的技术和经营水平等会获得怎样的评价呢？许金生在《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1884-1937）》（学林出版社，2009 年）中指出，就是日资杂货工业（不含在华纺织业），也具有示范功能和技术转移的窗口功能。但是，此类功能可否在上述两种产业和企业中予以确认，如不能确认，其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南满洲铁道的抚顺煤炭（第 7 章）和委托日本制铁经营的大冶铁矿（第 8 章）是通过国家资本采集资源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经营和技术水平会被如何评价呢？南满洲铁道自成立开始就与美国的技术相关联，在一战后不久甚至一度考虑在煤炭、铁矿、制铁业上开展日美联合经营。联合经营被否决后，南满洲铁道在制铁业方面研发出由贫矿转为富矿的独门技术。但是，抚顺煤矿的情况如何，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它是如何改进技术和改善经营？此

外，大冶铁矿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效率又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有必要在掌握在华纺织业、中小杂货工业和国策公司等的技术和经营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整理并综合分析其对当地经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我想提的最后一个遗留课题是，如何通过 20 世纪前半叶东北亚国际经济环境的关联，捕捉二战前在华日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日本对华企业投资，特别是大多数中小资本是在一战时的繁荣期进行投资的。由于在中国通过“元”来运用在日本通过“円”筹措到的资金，加上一战后经济萧条，又受到银币下跌的影响，给日资中小企业造成打击。中国在 1935 年之前没有统一货币和脱离银本位体制，与日本等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汇兑时，利率发生变动，从而压迫了与大资本不同且套期保值困难的中小资本的运作。二战前制约日本在华企业发展的东北亚金融、经济关联、甚至包括对物流系统等历史阶段的考察，均有望得到深入的研究。